

主编 侯占虎
审订 王凤阳 王宁

汉语词源研究

第一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

“汉语词源学是一门
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
词依据和音义状态为目
的的学科。”“词源的探
究涉及史前语言的状态，
汉语、汉字的形音义，
加上词源意义的潜在
特点，和汉字不直接表
达它的研究，因而具有
相当的难度，成为训诂
学的尖端课题之一。”



汉语词源研究



ISBN 7-5383-2999-4



9 787538 329995 >

G · 2678 定价:20.00

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基金项目

HAN YU CI YUAN YIAN JIU

汉语词源研究

(第一辑)

主 编 侯占虎

审 订 王凤阳 王 宁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2 号

汉语词源研究 第一辑

侯占虎 主编
王凤阳 王 宁 审订

责任编辑:李 静

封面设计:王 康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323 000 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 册 定价:20.00 元
印刷:吉林省吉育印刷厂 ISBN 7-5383-2999-4/G·2678

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

——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

(代序)

王 宁

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词源研究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中十分古老的课题，周、秦、两汉“小学”中的名物问题、声训问题、转语问题，宋代以来的热门话题“右文说”、“右音说”，训诂理论中关于“音近义通”问题的探讨，训诂方法中关于“因声求义”原理的阐明，都与词源有关。词源是语言原初历史的写照，又是古代文化的活化石；词源研究是语言学中最具解释性能的课题：多义词的引申途径、多音词中语素的结合功能、语言和文化的具体联系等等，都可以通过词源进行解释。但是，词源的探求远涉史前语言的状态，近及汉语、汉字的形音义，加上词源意义的潜在特点和汉字多不直接表音的局限，使它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成为训诂学的尖端课题之一。

20世纪以前，汉语词源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成果，但它只是训诂学的研究课题之一，最多只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并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20世纪以来，在西方词源学的影响和带动下，词源研究的重大意义和应用价值日益显现，世纪之交的汉语词源研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队伍不断壮大，方法不断完善，探讨日趋深入，它在当代发展

为独立学科已成为必然。在这样的形势下，由几位对词源研究有兴趣又有研究经历的中青年学者共同创意，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动承办，1999年8月1日至3日，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这是一次规模不大而意义和收获很大、既深入又务实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表现出的特点是令人回味的。

词源学涉及汉语的音和义，还与汉字的字形发生密切的关系。探讨词源必须兼通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第一手语料的把握上，要有古代汉语的积累，还需要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支撑；在方法上，单纯的归纳实证方法和单纯的演绎推论方法都不足以解决复杂的词源问题，必须既有词语考证的功底，又具细密的理论推论能力——这就是说，词源研究者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结构和多方的能力。但是，这个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在今天仍为如此多的学者——特别是一批青年学者所关注，这一方面因为它既有趣味，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包括对汉语字词的教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希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勇于知难而上的时代精神。在这次会议上，当老中青学者、南北中地区的词源研究得到广泛交流的时候，人们都意识到把词源研究推向21世纪、推动词源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责任。当然，大家也同时意识到：一个需要学力和毅力来精心浇灌的学科，如果用急功近利的短平快方式来粗制滥造，制造赝品，或许可以风光一时，最终也会被历史清洗。不必讳言，这个领域里的淘汰率也会很高。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是从两个学术源头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基于西方比较历史语言学的语源学研究，另一个是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二者的研究任务本来是一样的，但观念和方法均有较大差别。西方语源学研究在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采用方言、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以寻求词的原初语音形式。我国的传统词

源学则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用汉字为线索，以古音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工具，采取系联的方法，立足汉语内部词的同源词系联，来探讨汉语词的原初构词理据。从他们工作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任务虽然都是要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生时的音义结合状态，但西方语源学着眼语音更多一些，传统词源学着眼意义更多一些。在当代，两个渊源相互影响，学术上互相充实，但仍不是没有区别。看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们更偏重于接受哪个学术渊源的影响。当代汉语词源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都与两个学术渊源并存有关。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以立足传统训诂学的词源研究学者为主，如很多年来研究同源词问题、进行同源词系联的实践、产生了大量成果的王凤阳先生等。同时也有一部分在普通语言学 and 民族语言学方面的学者参加。如在民族语言研究上造诣很深、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十分熟练的孙宏开先生，重视准确地引进并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在比较词源学方面成就很高的伍铁平先生等。他们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汉语词源学的研究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使大家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思路，学习了新东西。20 世纪末的学术发展特点之一，是中西方学术的互相对话和互相渗透。在这个会上，体现了两个学术渊源的对话和渗透。可以看出，寻找适合汉语实际的方法，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汉语词源学，已经成为人们在世纪之交的共同愿望，必将成为 21 世纪的共同行动。

词源学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多角度的探讨；但是，建立和完善它的基础理论，清理它的术语体系，明确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促进它健康和迅速发展的前提。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见识彼此相容、互相吸收，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是必须有共同遵守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才是这门学科成熟的表现。既往的词源研究中，理论的混乱并不是不存在的。这表现在使用概念欠准确、观察语言事实缺乏正确的角度、操作方法欠科学等方面。例如，把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混为一谈；把史前时

期原生词的词源探讨，和有文献依据的同源关系探讨混为一谈；把历时分化带来的语音演变关系，和积淀到共时平面上的语音远近关系混为一谈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把目光首先投向词源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概念，例如，对汉语词源与汉字字源的区别和联系的探讨，对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本质区别的探讨，对同源词系联中音义关系的探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词源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会逐步完善、成熟，大家会在共同遵守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发挥自己研究的特长，形成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既往的汉语词源研究成果，多半与同源系联这个传统的方法有关。其实，汉语词源的研究涉及的内容远不止此。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俗词源、外来语词源、双音词词源、古文字与词源、古文化与词源等诸多丰富的研究题目，展现了词源学宽广的视野，多彩的内容。

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来自四面八方，年龄从30岁到70岁，但大家毫无拘束，坦诚相见，开展了各种意见的友好交锋。同时，大家怀着健康发展学术的共同愿望，声讨了用贩卖伪科学来欺世盗名、假学牟利的歪风邪气，弘扬了正气。

当第一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降下帷幕的时候，我们的预言是：汉语词源学这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凭借着它自身的生命力和它日渐强大的队伍，将在21世纪有巨大的发展。

（原载《中国教育报》1999.8.24）

目 录

汉语词源学将在二十一世纪有巨大发展

——首届汉语词源学学术研讨会述评（代序） 王 宁（1）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 宁（1）

谈谈汉语词源研究 刘又辛（9）

我对语源学若干问题的探讨 殷奇明（17）

汉语词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王凤阳（29）

汉语同源词研究概述 黄易青（120）

徐复先生的语源学研究 任继昉（151）

“二维度词源学”概述 杨光泰（161）

《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问题 曾昭聪（170）

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 郑张尚芳（179）

汉语同族词验证机制的缺失与构建 张 博（198）

汉语义类的形成及其哲学意蕴 周光庆 王一军（220）

论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双重性 孟遂生（234）

对同源词之间音义相对对应关系的考察和讨论 崔枢华（244）

利用谐声偏旁系联同源词探讨	侯占虎 李 静 (263)
字形分析和同源词系联	董莲池 (272)

汉语同源词的一种特殊滋生途径	阎玉山 阎 丽 (277)
试论流俗词源的性质	张绍麒 (287)
外来词与词源	程现林 (306)

试论同源字

——兼论《同源字典》的收字问题	邵文利 刘玉清 (312)
从《同源字典》收词疏误看严谨完善的同源词理论对同源词系联的 重要意义	于智荣 (327)

“悲壮”考源	张世超 (337)
释“风”及其同族词	张希峰 (341)
“寤生”解	傅亚座 (348)
说“紫”	韩格平 (351)
软体动物汉语命名理据考	李海霞 (355)

违背历史事实的例证

——评论《汉字哲学初探》汉语词源举例	伍铁平 (364)
--------------------------	-----------

编后记	(370)
-----------	-------

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一、当代汉语词源研究的两个学术渊源

当代汉语词源研究，是从两个学术源头发展起来的：一是基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研究，另一个是基于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二者的研究任务本来是一样的，但观念和方法均有较大差别。

西方词源学研究在方法上重视活的语言材料，采用方言、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词的语音演变轨迹，以寻求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音义结合的理据。传统词源学则从汉语书面文献出发，用汉字为线索，以古音音系研究的既有成果为工具，采取系联的办法，立足汉语内部词的同源关系，来探讨汉语词的构词理据。从他们工作不同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任务虽然都是要探讨语言中的词在发生时的状态，但西方语源学着眼语音更多一些，传统词源学着眼意义更多一些。所以有这样的侧重，是因为由于语言发生久远，人类对词的原初状态的探讨几乎是不可能的，可靠的材料必定是有文字记载的材料。西方的语言学大国多半使

* 我这篇文章，是想谈谈关于汉语词源研究的一些宏观问题，有些也是反映自己研究的一些甘苦。本来，每一节都涉及大量的语言事实和例证，但在这篇文章里，事实和例证我都不举了。为了总结汉语词源研究的一些心得，北师大两位博士写了两部博士论文：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和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那两部论文即将陆续出版。在两部论文里，我们的观点得到了很具体的阐发。所以，我这篇文章只强调一些主要的观点，具体的语料就不再列举了。

用拼音文字，语音信息保留较全面、准确，所以，西方语言学家对语音十分敏感。语音不只是保留在拼音文字里，更重要的是保留在活的口语里。亲属语言和方言都是现存的语言，都有口语形式，它们又是源语言分化的结果，它们的共时状态，反映的是源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的面貌。建立在这个原理和事实上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把探讨音系演变作为探究词源的手段，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汉语的相应文字是汉字，汉字是表意文字，保留意义信息比声音信息要准确得多，所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自古对意义就十分重视。汉字的表音机制极不完善，但是，在周秦时代，汉语词汇的分化是伴随着形声造字的。表意汉字能够让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意义。传统训诂学对意义问题和形体问题的重视自然也很有道理。其实，这两种不同的侧重并不意味着西方不重视意义、中国不重视语音。词源问题必须语音与词义并重，这一点恐怕是东西方没有区别的。二者的区别只是取材的着眼点和由哪里起步的问题。正因为两个学术渊源在对基本原理的认识上并无对立，因此，在当代，两个渊源在学术上是完全可以相互影响、互相充实的。但由于学术史上的一些原因，两种学术渊源至今没有相互吸收，因而不是没有区别。不是大家不想把二者结合起来，而是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大家的知识结构都有不足。看学者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们更偏重于接受哪个学术渊源的影响。

明白这两个学术渊源是很重要的，当代汉语词源研究中的许多分歧，都与两个学术渊源并存有关。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便难以吸收两个学术渊源的优点，寻找适合汉语实际的方法，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汉语词源学。

二、汉语词源研究中的音义关系问题

词的同源关系以音近为必要条件，判断音近必须运用历史语音学的研究成果。可是，判断同源词的音近关系谈何容易！

第一，“音近”是一个模糊概念，什么叫“近”，近到什么程度可以

列入同源探讨的范围，都难以定出一个标准。传统词源学的大家们定了一些条例，诸如“旁转”、“对转”、“同纽”、“同类”……不一而足，可一旦操作起来，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不可避免“无所不转”。

第二，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古音构拟，都带有一定的“假说”性质，有些结论属于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疑案，这就必然影响“音近”的判定。

第三，何况，同源孳生呈网络状，既多层，又多向，演变层次越多、轨迹越长，距离越远。就直接的分化孳乳来说，声音肯定是近的，如果把漫长岁月的多层次演变的一头一尾衔接起来，还能保证音近吗？

第四；加之个别词音变化的原因含偶然因素，任何条例都难以穷尽概括，也就是说，都有例外。

基于以上四个原因，纯粹用音系研究的成果来判断音近，又用语音为纲来进行同源系联，免不了滥与漏并存。

为此，词源研究必须关注另一个条件，即义通的条件。意义的内在性、个体化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它无规律可循，所以有些研究者不但不把它作为系联同源词的纲，连纬都不予考虑。的确，义通规律由于意义研究的薄弱、演变轨迹的难以把握、偶然因素的存在，比音近更容易有例外，探讨起来更容易带随意性。但它有规律可循是不能否认的。避免随意性的出路在于音近和义通两个条件并重，两个条件互相制约。两维交叉，避免主观随意性。

在词源研究中，义通的探讨有不少误区，最影响系联准确性的有两点：一是把汉字的造字理据与汉语的造词的理据混同；另一个是把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混同。造词理据、词源意义，传统词源学又称“意义特点”，它带有具象性，居于义素这个层次上，是与词汇意义不同的概念。

吸取传统词源学义通研究的成果，将传统词源学已有的理论阐发清楚，同时将其经验提升为理论，是使汉语词源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

三、汉语词源问题的历史时代特征

汉语词汇的积累大约经历过三个阶段，即原生阶段、派生阶段与合成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没有绝然分清的界限，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各以一种造词方式为主要方式。

汉语和世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有过一段为时很长的原生造词时期。这是汉语词汇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词汇如何从无到有，呈现什么状态，这是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反复探讨而又难以确证的命题。章太炎先生以为语言最初的发生与人的触受有关；也就是说，原生造词是源于自然之声的提示。这一说法在某些词上或可得到证实。例如，“蛙”、“鸡”、“鸭”、“鹅”、“鸦”、“猫”、“蟋蟀”……等动物是以他们的鸣叫之声来为之命名的；又如，“淋”、“沥”、“流”、“涟”、“涝”、“潦”……等词的词音似与水的滴沥声相关；“软”、“蠕”、“柔”、“茸”……等词的声母上古音都为“日”纽，发音时舌面腻黏，似能给人柔软的感觉等等。但是，这些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理性的必然？在天籁与人语之间存在着哪些规律性的联系？在已被记录下来的亿万词汇中哪些词属于原生造词的根词？由于语言发生的历史过于久远，不要说穷尽性的调查无法进行，就连一定数量的抽样调查和局部语料的归纳都是不可能作到的。所以，关于原生造词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假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原生词的音义结合不能从语言内部寻找理据，它们遵循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即所谓“约定俗成”。

派生阶段是汉语词汇积累最重要的阶段。在原生阶段的晚期，就已产生了少量的派生造词。而当词汇的原始积累接近完成时，派生造词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造词方式。这一阶段，汉语由已有的旧词大量派生出单音节的新词，并促进了汉字的迅速累增。周秦时代是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在纷繁的派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同源词。

合成阶段的到来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结果。汉语词汇在原生与派生造词阶段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由于音节数是有限的，区别同音词的

手段必然非常贫乏。而且，派生造词阶段正是古代汉语文献大量产生的时期，在书面汉语里，孳乳造字伴随派生造词，成为区别同源词与同音词的一种措施。这便使汉字的造字速度也极快增长。词与字的增长一旦超越了人的记忆可能有的负荷，凭借音变与字变而进行的派生造词便不能符合词汇继续增长的需要。恰好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汉语的构词元素积累到了一个足够的数量，为合成造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于是，在两汉以后，合成造词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主要的造词方式。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同时，大规模造字的阶段也就随之结束了。

汉语同源词系联主要系联单音节词和语素，这就是为什么词源研究一直属于先秦汉语研究领域，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源词系联都用《诗经》音系为线索。特别要提出的是，汉语的派生阶段，是与汉字的孳乳造字同步发生的；所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早就发现了“右文”现象，非常重视形声字声符在同源词系联上的线索作用，而且取得了不少成果。历史上的“右文说”，由于缺乏理论阐释，话说得片面一些，语例举得不一定全对，接受这个说法确实需要分析；但是，有一些偏重接受西方学术渊源的学者只相信声音，全盘否定字形的作用，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汉字和汉语的关系与拼音文字和它记录的语言的关系确有不同的地方，中国词源学的传统还是要有分析地继承，不能丢掉。

汉藏语系中语种的分化、汉语中方言变体的分化，应早于汉语标准语内部单音词的分化，所以，要想把词源探讨的历史时代再行推前，必须学习西方语源学的历史比较方法，进行民族语言的比较、方言的比较。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到早于周秦的语音和词义状况。这就是两个学术渊源必须相互补充的原因。

汉语词汇的派生分化，主要是在周秦时代，少数是在其他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的，因此，解决词源问题还要涉及历史文化背景的问题。探求词源，逐一分析可能追寻到的造词理据，在具有大量成果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个局部的词族系统，这属于语言词汇的本体研究；而阐释词源，对这些造词理据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从文化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证明和

阐发，这已涉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阐释词源的诸多成果集中起来，可能大致看出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网络，形成语言与其他文化的互证关系。这就超出了语言的本体研究，具有了宏观语言学的意义与价值。

这一步工作必须涉足民族文化的大网络、巨系统，不应当简单化。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是对词源与文化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并找到由语言本体出发深入到民族文化历史总体的可靠途径；还必须从分析微观的语言事实入手，继而达到宏观认识的目的。这是词源研究中难度更大又不可缺少、必须面对的课题。

四、关于汉语词源辞典的编写

近年来，有些人想编汉语词源辞典——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但是，一部较为完整的词源辞典应当贮存汉语个体词的早期语音形式和造词理据，反映汉语词际的同源关系。而且，辞典的词条必须是模式化了的。词源辞典与以反映词汇意义为中心的词汇辞典在编则与编例上必然是不同的。要编好这样的辞典，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最基础的条件：

一、科学汉语词源理论及可操作方法的初步完善和系统化。

二、已被证实的个体词的词源积累到足够的数量。

三、词的词源意义、文化阐释都有了一种模式化的表述形式。

四、词的原初语音形式构拟有了共识，不再众说纷纭。

编这样一部词典不只需要人力，更需要较强的学术功力，应当说，就目前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看，编写这样一部词典的队伍还没有形成。有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似乎还没有到位。

第一是语料的准备工作。应当说，汉语词源的探求，同源词的系联，现在已是语言学界的热门课题之一，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成果。但是，现在已经经过系联的语料，大多是用单一的方法作出来的，因为，参与工作的学者，熟悉亲属语言的，不一定熟悉方言；亲属语言和方言都能把握一些的，又不熟悉训诂学；传统训诂学和古韵学都通的，掌握

亲属语言和方言又太少……这其实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两种学术渊源尚未综合在一起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语料的准备难以全面。还加上，由于词源学的基础理论尚未普及，个别词源的考据往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前面说到的哪些理论混乱——使有些考据难以成为的证确考。而词典是不能搜集未定论的语料的，明显错误的更得抛弃，即使想编一部局部的词典，搜集和选择材料的工作也还有相当的难度。

第二是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看到，有些正在操作的、被称作“词源词典”的项目，由于理论原理尚未理清，总体的编则和编例都很缺乏科学性，有把词源词典与词义词典混同之嫌。例如，有人编写的词源词典按现代音序编排，把同源词分置各汉语拼音音头之下。这种做法说明，编写者不懂得汉语词源据音系联的“音”必须是上古音系而绝非现代普通话音系。他们也不懂得，同源词的音近是用音节为单位来衡量的。用现代普通话的音名为序来编词源词典，把同源词搞得支离破碎，失根失据，对学术是个扰乱。而且，凡是这种“词典”，许多词条都分不清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甚至把纯粹解释造字意图的形源也混迹其中。这种编法，反映出主编或编写者恐怕对两种学术渊源哪一种都没有入门。

第三是编写体例的设计问题。由于系联同源词的实际工作尚未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编例很难设计。现有的几种编排方法对于一般的专著说来，虽都有优点，但是作为模式固定的词源词典来说，都不够理想：

第一种，用“声母”为纲，也就是用形声字的声符系统为纲。这符合汉语词汇发展历程中派生造词伴随孳乳造字的部分事实。但是，造词与造字毕竟是两回事，它们有一部分重合，并不是全部重合。传统训诂学家对“右文”涉及形声字的数量估计很高，认为在《说文解字》中有示源作用的声符可以占到90%以上，这个估计是否符合事实？在同源字系联尚未达到一定数量时，还不能得到进一步证明。因此，以字形为纲不但在理论上让人难以接受，在事实上也总有点让人不放心。

第二种，按上古音为纲来编排。这似乎体现了“音近”的原则，但正如前面所说，“音近”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而且，汉语的“音近”